

莫  
砺  
锋

江  
西  
詩  
派  
研  
究

齐  
鲁  
书  
社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

江西诗派研究

莫砺锋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0.75印张 2插页 237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书号 10206·155 定价 2.25元

# 目 次

绪 论	江西诗派的研究价值 .....	1
第一章	江西诗派的产生 .....	5
一	时代背景 .....	5
二	北宋诗坛概况 .....	12
三	黄庭坚在江西诗派中的领袖作用 .....	15
第二章	江西诗派三宗之一：黄庭坚 .....	23
一	黄庭坚的作品 .....	23
二	黄庭坚诗的思想内容 .....	24
三	黄庭坚对前人诗歌艺术的继承 .....	36
四	黄庭坚诗歌艺术的独创性 .....	45
第三章	江西诗派三宗之二：陈师道 .....	63
一	陈师道的作品 .....	63
二	陈师道诗的思想内容 .....	64
三	陈师道诗歌艺术的渊源 .....	68
四	陈师道诗歌的独特艺术风格 .....	75
五	陈师道在江西诗派中的地位 .....	80
第四章	北宋的其他江西派诗人 .....	87
一	列入《宗派图》的诗人 .....	87

二	没有列入《宗派图》的诗人	121
<b>第五章</b>	<b>江西诗派三宗之三：陈与义</b>	<b>138</b>
一	陈与义的作品	138
二	陈与义诗的思想内容	139
三	陈与义诗歌艺术的渊源	143
四	陈与义诗的艺术特色	151
五	陈与义在江西诗派中的地位	155
<b>第六章</b>	<b>南宋的其他江西派诗人</b>	<b>162</b>
一	吕本中	163
二	曾几	170
三	赵蕃、韩淲	177
四	方回	182
<b>第七章</b>	<b>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b>	<b>192</b>
一	关于诗歌思想内容的理论	192
二	关于诗歌艺术形式的理论	200
三	关于诗派艺术渊源的理论	214
<b>第八章</b>	<b>江西诗派的影响</b>	<b>226</b>
一	江西诗派在南北宋之际的影响	226
二	江西诗派在南宋的影响	228
三	江西诗派在金代的影响	242
四	江西诗派在元代的影响	243
五	江西诗派在明代的影响	243
六	江西诗派在清代的影响	244
七	结论	251
<b>结论</b>	<b>江西诗派的历史评价</b>	<b>260</b>

附录一 江西派诗人的政治态度 .....	271
一 黄庭坚 .....	271
二 陈师道 .....	272
三 韩驹、徐俯 .....	273
四 陈与义 .....	276
五 吕本中 .....	277
六 其他 .....	278
附录二 黄庭坚“夺胎换骨”辨 .....	283
一 “夺胎换骨”说的实质 .....	283
二 黄庭坚诗歌创作中的“夺胎换骨” .....	289
附录三 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考辨 .....	306
一 写作年代 .....	306
二 江西诗社名单 .....	310
三 江西诗派总集 .....	314
引用书目 .....	321
后记 .....	335

## 绪论 江西诗派的研究价值

江西诗派是宋代诗坛上最重要的一个诗歌流派，也是我国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学现象之一。

江西诗派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成员众多且不断发展。

北宋末期，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首先提出“江西诗派”这个名称，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并开列了陈师道等二十五人的诗派名单。以后，这份名单又不断地得到补充。到南宋赵彦卫写《云麓漫钞》时，吕本中本人已被归入诗派<sup>[1]</sup>，刘克庄则把曾几等人归入诗派<sup>[2]</sup>，严羽把陈与义归入诗派<sup>[3]</sup>，宋末的方回更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尊为江西诗派的“三宗”<sup>[4]</sup>。此外，陆续地被归入江西诗派的较次要的诗人尚有曾纘、曾思、赵蕃、韩淲、方回等人。

### 二、活动时间长。

从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到方回替江西诗派作出总结，其间师友传授，绵延不绝，江西诗派的活动前后持续了二百多年。

### 三、成就高。

江西诗派中成就较高的诗人比较多，如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其他如曾几、吕本

中等，也不失为宋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他们以各具特色的诗歌创作，在我国古典诗歌的百花园中增添了一丛奇葩。此外，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也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四、影响大。

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南、北宋之际已经非常显著，当时有不少诗人虽然没有被看成是诗派的成员，但是在创作上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较大的影响，如汪藻、刘子翥等人。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是笼罩了整个诗坛，如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虽说他们后来都摆脱了江西诗派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使在南宋后期“时人不识有陈黄”<sup>[5]</sup>的风气之中，某些江湖派诗人也还受着黄庭坚的影响。而标榜自己“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sup>[6]</sup>的严羽，实际上也受到江西诗派诗论的一些启发。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以后也不绝如缕，直到晚清的同光体诗人身上还反映着它的绮丽余波。

为了有所比较鉴别，我们不妨看看宋代的其它诗派。宋代在江西诗派之前有西昆派，在它之后有四灵派和江湖派。西昆派在宋初曾风靡一时，“杨刘风采，耸动天下”<sup>[7]</sup>，但是“不隔一朝，遽尔湮没”<sup>[8]</sup>。四灵派成员只有四人，虽然叶适曾对他们大力称扬，但毕竟因才薄境仄而很少有人追随仿效。江湖派虽然成员众多<sup>[9]</sup>，但刻过几部总集之后，随即一蹶不振。这三个诗派不仅历时短促，而且都没有产生可与江西诗派锺子相媲美的重要诗人，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更是不可与江西诗派同日而语。

可是，人们对于江西诗派的研究是做得很不够的。在前人的诗话、笔记中，虽然常常有涉及江西诗派的断言片语，但那

些言论往往是针对黄庭坚等个别诗人而发。即使有谈到整个江西诗派的，也大多是针对某一个侧面，很少有全面的研究和评价。所以有许多关于江西诗派的问题一直就没有弄清楚。比如江西诗派到底包括哪些诗人，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照理说，江西诗派中最重要的诗人首推“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应是没有疑义的，但人们在批评江西诗派时，却往往把他们排除在诗派之外。例如金人元好问说：“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sup>[10]</sup>清人钱大昕说：“后山与黄同在苏门，诗格亦与涪翁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诞甚矣。”<sup>[11]</sup>今人所编的一种文学史著作中又说陈与义学杜“比江西诗派中人取得较高的成就”<sup>[12]</sup>，等等。对这种基本问题的论述尚且如此，遑论其它。到了现代，学术界对江西诗派的重视也很不够。迄今为止，尚未有研究江西诗派的专著问世。在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中虽然都论及了江西诗派，有的还辟专章予以论述<sup>[13]</sup>，但限于体例和篇幅，这些论述都比较简略，而且对江西诗派的缺点和消极影响谈得较多，而对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则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我们认为，不对江西诗派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但会影响对诗派本身作出公允的评价，而且会影响对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因为，一、江西诗派是古典诗歌发展到宋诗这个阶段时的重要环节，如果不把江西诗派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也就无法了解宋诗是如何在唐诗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二、江西诗派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不把江西诗派的庐山真面目弄清楚，也就无法对受它影响较深的诗人如陆游、杨万里及清代同光体诗人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

对江西诗派进行深入研究，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为了



引起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不揣浅陋，试作初探，并把自己研究所得的一孔之见撰成此文，以期得到学术界的指教。

---

[1] 见《云麓漫钞》卷十四。按：《云麓漫钞》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

[2] 见《茶山诚斋诗选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

[3] 严羽说：陈与义“亦江西之派而小异。”见《沧浪诗话·诗体》。

[4] 见《瀛奎律髓》卷二六。

[5] 戴复古：《昭武太守王子文日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因有论诗十绝。子文见之，谓无甚高论，亦可作诗家小学须知》之一，《石屏诗集》卷七。

[6]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沧浪诗话》附录。

[7] 见欧阳修《六一诗话》。

[8] 清人冯武语，见《重刻西昆酬唱集序》，《西昆酬唱集》卷首。

[9] 江湖派的总集已佚。清代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成《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去其重复，尚收有九十四人的作品。

[10] 《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二八，《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一。

[11]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江西派”条。

[12]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六二七页。

[13] 例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 第一章 江西诗派的产生

## 一、时代背景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结束了军阀割据的长期混乱局面。经过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四朝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封建经济有了较程度的发展。据《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记载，英宗治平三年（1066）全国载入版籍的人口已达二千九百零九万，创造了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的最高纪录。但与此同时，宋王朝内部的危机也越来越严重。大地主大商人的土地兼并和重利盘剥，空前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对辽和西夏的巨额岁币等沉重的负担使广大农民陷于悲惨的境地，阶级矛盾也因之日益尖锐。面对这种局势，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挽救之方。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上万言书言事，提出了变法的纲领。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三年（1070）任命王安石为宰相，新法开始付诸实施。但是，新法一开始就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猛烈反对。由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本来是对人民较为有利的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时生弊端。神宗去世后，高太后执政，退居洛阳十五年的司马光东山再起，一年之内尽废新法。以后新旧两党此起彼落，斗争愈演愈烈，革新和

保守的斗争逐渐蜕化成为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到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入相时，虽然仍打着王安石的旗号，但此时的“新法”已经名存实亡，北宋王朝不久也就被女真贵族侵略者倾覆了。

江西诗派就产生在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里。有些论者因此认为“江西诗派的产生和发展”，“和北宋末和南宋的国力很弱、对少数民族割据者主退让、力求维持暂安局面的情况分不开”<sup>[1]</sup>，我们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文学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意识形态，它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除文学之外的其它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就象恩格斯所说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sup>[2]</sup>而文学现象与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更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所以，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确实与它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去看待这种关系，不能认为这个文学流派就一定是当时的政治形势的产物，更不能认为它的产生一定体现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对于江西诗派的产生与其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

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早期江西派诗人都经历了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新旧党争，而且基本上都站在旧党一边。但尽管如此，江西诗派仍然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流派，并不带有政治色彩。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黄庭坚等人大多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站在旧党一边，但并不象司马光那样极端顽固，也就是

说，他们在新旧党争中的立场是比较消极的。比如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就相当开明。虽然他十分尊崇旧党领袖司马光，在挽司马光的诗中说：“毁誉盖棺了，于今名实尊。哀荣有王命，终始酌民言。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公心两无累，忧国爱元元。”<sup>[3]</sup>可谓极尽推崇之能事。他与旧党人物苏轼的关系十分密切，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并屡次与苏轼一起被贬谪。他极口赞颂苏轼的政治立场和文才：“眉目云开月静，文章豹蔚虎炳。逢世爱憎怡怡，立朝公忠炯炯。”<sup>[4]</sup>当苏轼被滴过海后，他对之怀念不已：“东坡海上无消息，想见惊帆出浪花。”<sup>[5]</sup>但另一方面，黄庭坚对新党领袖王安石也非常尊敬：“然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sup>[6]</sup>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拜相后，庭坚作诗说：“圣绪今皇纘，真儒运斗枢。”<sup>[7]</sup>甚至在王安石已经罢相以后，黄庭坚还把安石比作吕尚、傅说和箕子：“钓筑收贤辅，天人与圣能。”“昔在基皇极，师臣论九畴。”<sup>[8]</sup>他还高度评价王安石的学术成就：“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sup>[9]</sup>“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sup>[10]</sup>陈师道的政治态度比黄庭坚更为保守一些，他对王安石颇抱偏见，说：“范文正公谓王荆公长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由今观之，岂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谓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为腹心，故王氏之得祸大也。”<sup>[11]</sup>他尤其反对王安石的新学，《宋史》本传说：“熙宁中，王氏经学盛行。师道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他自己也在诗中表示要“探囊一试黄昏汤，一洗十年新学肠。”<sup>[12]</sup>但师道很少从正面攻击新法，而且认为司马光的做法也为过激：“尝谓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

齿扼腕，诚非为己。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甚复溺之忧，前日王荆公、司马温公是也。”<sup>[13]</sup>至于黄、陈周围的其他早期江西派诗人，多数是黄、陈的晚辈，他们在政治上一般也站在旧党一边，但态度都很消极。而且其时的新旧党争已经逐渐演变成官僚集团之间的宗派斗争。比如饶节曾为丞相曾布之客，后因上书论新法与曾布不合而离去<sup>[14]</sup>。此时王安石早已去世，曾布、蔡京之流虽然打着王安石的旗号，但所谓的“新法”早已面目全非了。

第二，黄庭坚等人在仕途上不甚得意，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他们虽然置身于旧党中，但只是一批追随者而不是主将。比如黄庭坚踏上仕途后，一直担任下级地方官吏。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他也只任神宗实录检讨官，在新旧党争中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陈师道更是仅做过州学教授之类的学官，始终没有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其他的早期江西派诗人，有的是沉沦下僚的小官吏，如江端本、夏倪、汪革等人；有的是终老林泉的隐士，如潘大临、谢逸、谢薖、林敏功、林敏修等人，都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而仕宦较显的吕本中、陈与义等人都是在南宋才担任较重要的职务的，其时虽然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牌位还在孔子庙和神宗庙里争夺一席之地<sup>[15]</sup>，但这种新旧之争已完全失去当初的意义了。

所以，黄庭坚成为江西诗派的领袖，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态度，也就是说，江西诗派的形成不是因为这些诗人有同样的政治观点。否则，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与苏氏兄弟等人在政治上同属旧党，在宦海中一起浮沉，可称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如果相同的政治态度能形成文学流派，那他们早该形成一个“西蜀诗派”了。但事实上苏轼兄弟与门下的“四学士”

并未形成一个诗派，这说明江西诗派的产生与北宋的新旧党争没有必然联系。

北宋建立以来，对外政策一贯是以妥协退让为基本方针的。而自从受到女真贵族的侵略之后，宋王朝更是实行民族投降主义的路线，对咄咄逼人的侵略者一味退让，只求保住半壁河山的苟安局面而不图恢复中原。黄庭坚等人虽然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是他们对朝廷一味妥协的对外政策也是不满的。黄庭坚曾对割地纳币的外交政策加以讥讽：“百里弃疆王自直，万金捐费物皆春！”<sup>[16]</sup>他认为对于边事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百年休战士，当日纵前禽。欲断匈奴臂，不如此留心！”<sup>[17]</sup>并讽刺朝廷无意收复失地：“耆老深望幸，銮舆不好游！”<sup>[18]</sup>陈师道很少对政事表示意见，但他在送杜纯赴边时说：“国家有急君得辞？徐人不劳叩关请。陇上壮士莫扞舌，河西狂王防系颈！”<sup>[19]</sup>也是要求抗敌御侮的。黄、陈之后的江西派诗人中，很多人亲身经历了靖康之变前后的民族斗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的态度和立场不尽相同，个别败类如洪刍曾在靖康事变时替金人敛财，完全丧失了民族气节。但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抵抗侵略，拥护爱国将士的抗金斗争，其中如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还写下了许多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辉的诗篇，替宋诗增添了光彩（详见附录一：《江西诗派的政治态度》）。那种认为江西诗派的产生和发展与宋王朝对外主退让的情况分不开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江西诗派的形成也不是因为这些诗人在民族斗争中有着基本一致的要求抗敌的立场，因为当时主张抗金的文人中，也有一些人是对江西诗派深表不满的，如张戒、黄彻等。这说明江西诗派的产生与北宋末的民族斗争没有必然联系。

那么，江西诗派的产生与其时代背景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考察一下北宋的经济、政治等因素对整个诗坛有些什么影响。

第一，北宋建国以后，封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的恢复，工商业的繁荣，都市的发达，使得中小地主阶级的士人也有相当好的物质享受。尤其重要的是，北宋政权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优待官僚阶层及其候补者——士人的政策。北宋科举取士之多，官吏数目之冗滥，俸禄之优厚，都是史无前例的。诚如清人赵翼所云：“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sup>[20]</sup>这样，多数士人都能得到做官食禄的机会，甚至隐居孤山不入城市的林逋也曾两次接受朝廷所赐的粟帛。<sup>[21]</sup>我们试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魏泰《东轩笔录》等宋人笔记，便会惊讶当时士人生活之奢华，当时象陈师道那样一贫如洗的士人是非常罕见的。安定、优裕的生活使诗人有条件从容酬唱，钻研诗艺，但同时也使大多数诗人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变远了。虽然王禹偁、梅尧臣、苏轼乃至江西诗派的黄庭坚等人都写过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但毋庸讳言，这些作品在反映人民痛苦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能与杜甫等前代诗人的作品相比。

第二，北宋统治者虽然对士人予以优厚的物质待遇，但在思想上的禁锢却比唐代严密得多。到了黄、陈的时代，新旧党争又异常激烈，文人很容易因文字而得祸，苏轼的乌台诗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宋代的诗人在用诗歌讽刺时弊、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这方面远远比不上唐代诗人那么大胆。南宋的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官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

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sup>[22]</sup>这段话很符合北宋的实际情况。

第三，北宋的理学空前发达，儒、道、释三家思想逐渐融化，私人讲学蔚然成风。风气之下，士大夫都喜欢抽象思辨。且不说柳开、穆修、石介的宣扬道统和邵雍、二程的高谈性理，即使象欧阳修那样杰出的文学家，也常常在诗文中阐述圣贤之道。而且，北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处于外患的威胁之下，内部也危机四伏，有识之士对这种形势颇感忧虑，常常要对国事发表议论。风气之下，北宋的诗人们都喜欢在诗中发议论，说道理，进一步发展了从韩愈开始的以文为诗的倾向。

第四，北宋的文化事业比较发达，造纸业和印刷业空前地兴旺。早在北宋初期，成都刻大藏经已达十三万板，国子监刻经史也达十多万板。到仁宗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板。东京、杭州、蜀中、福建成为举世闻名的印刷业中心<sup>[23]</sup>。这样，国家和民间的藏书都非常丰富，人们有条件博览群书。所以，北宋的诗人大多数是读破万卷的学问家，他们做起诗来也就比唐人更喜欢用典故，显学问，并且喜欢在这些方面争奇斗巧。

所以，与唐代相对而言，北宋的诗人容易产生这样的倾向：比较轻视诗歌的思想内容而更加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虽说许多杰出的诗人努力摆脱时代的不利因素的影响并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总的说来，这样的倾向确是存在于北宋诗坛的。江西诗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由一群注意探讨诗歌艺术技巧的诗人们组成的诗歌流派。

然而，上述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只是江西诗派产生的间接原因，而更重要的直接原因，必须从文学本身的发展中



去探索。

## 二、北宋诗坛概况

与唐诗一样，宋诗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才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它的独特风貌。

宋初诗坛上活跃着不少诗人，其中如王禹偁等人在创作上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的说来，此时的宋诗仍停留在模仿前人的水平上，而缺乏在唐诗藩篱之外自立门户的气概。

王禹偁是宋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是宋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sup>[24]</sup>他在论诗主张上崇拜杜甫，在创作实践上则受到白居易很大的影响。例如王禹偁集中较优秀的代表作《感流亡》、《对雪》等，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与白居易的《观刈麦》一类诗很相似，有摹仿白诗的显著痕迹。所以，尽管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纵横吾宋是黄州”<sup>[25]</sup>，我们也应该重视他的创作成就，但必须指出，王禹偁在诗歌艺术上缺乏鲜明的独特风格，他的诗歌还没有体现出宋诗的特色。

与王禹偁同时的诗人还有寇准、林逋、潘阆、魏野等人，其中林逋诗名较著，他的咏梅诗脍炙人口，受到黄庭坚激赏的“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一联<sup>[26]</sup>，遗貌取神，瘦硬生新，已微呈宋调。可是这种诗在林逋集中毕竟很少，林诗的基本风格很接近白居易的闲适诗。潘阆、魏野等人则以中唐的贾岛为学习的典范。总的说来，这些诗人的作品情调柔弱，意境狭小，在思想内容上缺乏时代气息，在艺术形式上也没有自